



餘干縣文史資料

第六輯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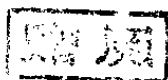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余干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157/20
余干县文史资料

第六辑

(内部交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余干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

庆祝：

建国四十周年！

人民政协成立四十周年！

周恩来总理倡导文史资料工作三十周年！

余干县文史资料第六辑目录

▲历史风云▲

- 一、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投诚的始末……胡 先 (1)
- 二、参加成都起义的一些回忆
……张鸿图供稿 黄文政整理 (8)
- 三、北伐军光复余干县城的经过……江文远 (15)

▲时代足迹▲

- 四、回忆白云乡的土地改革……彭点清 (18)
- 五、余干县一九五四年大水灾的概况……万元开 (26)
- 六、新旧社会两重天
——记解放前后的余干县社会福利院
……吴增慧 (31)

▲抗日烽火▲

- 七、江家港军民抗日日观的纪实……江文远 (35)
- 八、从大收拾旧山河
——忆抗战胜利后接收九江地区的见闻……章成宪 (38)

▲史海拾零▲

- 九、对余干县立简师概况的回忆……黄文政 (46)
- 十、余干县交通运输概况……吴家骥 (51)
- 十一、余干县司法审判机关的沿革……朱文清 (60)
- 十二、解放前余干县合作事业概况……赵成章 (63)

▲社会一隅▲

- 十三、三青团余干分团的组织概况……………吴家骥 (66)
- 十四、三乘教在余干的始末……………江林波 (68)
- 十五、一起重大的翻船事故……………万年开 李凡水 (71)

▲旧事杂谈▲

- 十六、关于太平军在余干的一些活动
……曹靖中 黄文政收集整理 (75)

十七、黎明前的黑暗

- 回忆解放前夕的余干……………李桂芳 (87)

- 十八、记一伙北洋联军逃窜大塘的经过……………吴 卓 (93)

- 十九、血债累累的蔡子超……………黄文政 (96)

- 二十、戴森荣《在大塘剿匪》的事实真相……………吴 党 (103)

- 二十一、元末朱、陈鄱阳湖大战史话 (下)……张永峰 (106)

▲人物春秋▲

二十二、满清王朝末届举人

- 曾秀章先生致事……………吴建威 (125)

▲地方风貌▲

- 二十三、余干县的民间灯彩……………陈文杰 (129)

- 二十四、余干特产——芡实……………何焕荣 (132)

- 二十五、富湾鸭制品总厂的梗概……………张治凡 李凡水 (134)

▲政协资料▲

- 二十六、政协余干县——六届委员会简介……………张祥江整理

- 二十七、政协余干县第六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 二十八、编后记……………(158)

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投诚的始末

胡 先

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是于1948年春成立的，总队长由县长兼任。副总队长开始是由军事科长兼任，同年8月，省保安司令部委任张四维为自卫总队专职付总队长。张四维系瑞洪镇南墩张家村人，可是掌兵权的都是余干县张、吴、李三大姓的人，如张秋林任少校总队付，张鹤年任第一中队长，吴坤任第二中队长，李琦任第三中队长。在此情况下，张四维虽有较硬的政治背景，也只好迁就地方封建势力，对张、吴、李三大姓氏的军官，一个都不敢动。当时唯有第四中队长，是外籍人，不久就被排挤走了。这样，张四维便委任其胞弟张罗为第四中队长，并兼任特务中队长。1949年2月间，省军区司令部、保安司令部，会同制订了《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加强编组办法》，增设付总队长兼军事科长一名。这个拥有军政大权的付团要职，结果又落在大姓张秋林的手里。同年3月，张秋林被调任县府田粮处一科科长后，此职经南城团管区人事科批准由胡先接任。后张四维在余干县城解放前夕率部分队伍撤走，1949年5月1日，由县参议会议长张恭宾报请县府秘书罗伯元代行签发张秋林补任张四维的遗缺。张秋林上任后即任命张福庚为第一中队长，吴坤为第二中队长，李琦为第三中队长，彭一飞

为第四中队长。这四个中队长，除了张、吴、李三大姓的人以外，加上了一个武靖队的彭一飞。

从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来看，就可以发现在当时的地方封建派系势力的内部中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加之士兵都是为躲壮丁、拉关系参加自卫队的，所以在士兵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宗派观念：

1948年秋后，面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攻徐州之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调配精锐兵团，全力以赴，保卫徐州。江西军区司令李思索鉴于局势严重，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余干县政府派军事科长胡先赴省出席，听取了省军区李思索的报告。会议主要精神是：一是加派兵员补充；二是要认真编组民众自卫总队，充实地方武装力量。李思索为了完成这两大任务，采取了杀一儆百的威胁手段，在大会上铅山县军事科科长出言不逊，被当场逮捕，李并声色俱厉地对所有到会的军事科长说：“一律具结限期完成任务，否则要枪毙几个军事科长”。结果，各县军事科长，都纷纷具结限期完成任务，表示绝对服从命令。

1949年3月，正当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闻风而逃的时候，余干县县长兼总队长钟国楨接到江北解放军一个战士的来信，内容大致是说：他脱离了反动军队的束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纪律严明，军民一家，所到之处，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现我军正部署渡江南下，希望家乡早日得到和平解放，相信这也是处于水深火热的余干人民的迫切愿望。呼吁余干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要提高自己的觉悟，立功赎罪，争取人民的谅解，人民政府是会既往不吝

的。如果继续为国民党卖命，那就是自绝于人民。并附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等材料。钟县长看罢信后，心情十分沉重地对胡先科长说：“共军过了江，余干位濒鄱湖，首当其冲，我们不走就要当俘虏了。”果然，此后他便与张四维逃往南昌，另找出路。后来，钟调任安福县县长，余干县长一职就由国民党省政府委派黄坑军校四期学生钟声继任。钟感到这个县长不好当，就拒不到职。于是付总队长张四维乃自告奋勇向保安司令胡素说：“我有力量以自卫队为基础发展为一个团的兵力。”胡素认为只要有一个团的兵力，就任命他为保安十一团团长。张四维潜回余干县后，便把自卫总队五个常备中队扩编为一个团，并要求付总队长兼军事科科长胡先为他在余干县25个乡、镇内补充一千兵员。

张四维与胡先共同商定，保安十一团兵员补充来源出自余干，部队仍驻防余干。要求胡先召集乡、镇长联席会议宣布，迅速完成征兵（壮丁）任务。但是，胡先认为这不符合政令，必须请示军、师、团管区批准后才能执行。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渡江的号角，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到处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国民党军队犹如惊弓之鸟。4月29日张四维于清晨找到胡先说：共军已到达乐平，急行军只要一天就能到余干。而省保安司令部的密电也告知共军已从九江附近渡江南下。张四维言外之意是想带走余干县的地方武装部队，赶上省保安司令部一同南撤逃命。他问胡是否随军撤走。胡答复等必要时再作决定。当天晚上7时许，胡的妻舅李琦，惊慌失措地来告诉胡先：张四

维紧急命令部队夜行军。据透露，可能是带队伍到南昌受编。胡先向李琦公开了秘密；共军已渡江了，省保安司令部准备撤走。张四维曾问我走不走。接着，胡先分析了李琦反映的问题，认为没有必要紧急命令突然搞夜间行军演习。胡对李说，这是张四维欺骗你们，真正公开宣布共产党来在我们面前，为了逃命而撤走，官兵大多数会反抗；他要是强迫命令，包括他们主要带兵官，都要小心士兵的枪口对着你们！你可同吴坤、彭一飞等共同商量研究对策。接着李又征询了胡的意见，胡说：张四维的命令是夜间行军演习，过了龙津河，你们的部队要紧靠豹皮岭停止前进，他如再下命令就继续缓慢前进。同时可向他将理由提出，士兵都是余千人，他们如果同意撤走，离开家乡，原先就不会参加自卫队躲壮丁；如果张四维用张罗部队威胁，你可把部队拉上豹皮岭。另一方面，你们走了，县政府马上会召集各界人士会议，研究对策，对张四维提出意见。部队演习当然可以，但不应该违背诺言把部队骗走（原来张四维说了保安十一团兵员出在余干县，部队仍要驻防余干的）。

李琦把胡先对他说的情况都对吴、彭等人暗中传达了，并妥善作了安排。由于这时洪水泛涨，渡过了西仙渡要绕圩堤走，到达龙津河岸时，因河面较阔，李琦、吴坤、彭一飞部队停驻付家弄听候县政府的调令和各公共团体来信，再作计议，并密切注意张四维派来监视他们的张思毅、张焕等人的动态。吴坤暗示了分队长何自然、程志平，李琦暗示了刘寿令、李国英等对他们采取了反监督的措施。

4月30日清晨，余干县政府召集各界人士在大礼堂开

会，会议由付总队长兼军事科长胡先主持。会议决定：1、根据路过黄金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来信指示，立即成立治安委员会。2、县政府直接下令调吴坤、李琦的部队，并由各界人士代表写信给张四维，请求同意余干县政府抽调吴坤、李琦、彭一飞等率所部回城维持治安。并专派彭一飞的父亲彭式人送信。3、部队回来派张秋林接任张四维职务。4、县政府军事科主办行文（李江辉起草、胡先核实）。

军事科长胡先立即以县长兼总队长钟国桢、主任秘书罗伯元的名义代为行文，到会各界人士签了字，交给了彭式人送发。各界人士写给张四维的信，由参议会付议长罗自强负责派人传送。

吴坤、李琦、彭一飞接到调令，当即召集部下军官开会宣布调令。同时吴坤、李琦带了随从人员赶赴枫港，向张四维请示行动。并请送调令的彭式人先去枫港向张四维说明县城的混乱情况。吴坤、李琦与张四维本来就是有分歧的，所以，他二人走到枫港高公信楼上和张四维刚一见面，张不待他俩开口请示，就怒气冲冲地说：我知道你们的来意，是接到县政府的命令要回县城。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究竟服从县政府，还是服从保安司令部呢？回去我不阻止，不过要你们负责把官兵的武器缴下来。再者就是后果由你们自负。在此瞬间，随从人员蜂拥上楼要吴坤、李琦赶快回队伍。说士兵情绪混乱，因为听说要缴枪，都说：“谁要缴他的枪，他的枪口就对准谁。”张四维听后故作镇定，威胁李琦、吴坤说：“你们先回去吧，告诉士兵，说我讲了，谁要造反就枪毙谁！”

吴坤、李琦回到部队说：团长听到你们说了“谁要缴枪，枪口就对准谁”的话，他的回话是“谁要造反，就枪毙谁”，这不过是互相恐吓。我们是余干县自卫总队，既然余干县城治安混乱，急需我们去维护安全，我们就应该听从县政府的调令。如果不去造成恶果，全县人民必然要归罪于我们。好吧，我们就下定决心，开回县城。我们的行动除了张四维、张罗兄弟反对，其他兄弟部队官兵也会觉察受骗，都会赞同我们这样做的。甚至于要相继效尤呢！这一番话，放下了士兵们要回县城就会引起流血冲突的思想包袱，于是吴坤、李琦、彭一飞一声令下，部队就浩浩荡荡地开回县城。他们刚到达西仙渡，就遭遇到上百只小船，准备进城抢劫。吴坤、李琦毫不犹豫，先指定林班长叫机枪手对空连放三枪，以示警戒，然后连续扫射，控制子弹拦截小船前进的航路。赶走了这伙歹徒，县城人心大快！

当吴坤、李琦到达与县城隔河相望的地点时，等在河边的人群，在爆竹声中向归来的队伍招手欢迎。人们最关心的，就是怕张四维不让吴坤、李琦、彭一飞带队伍回来。所以见面时头一句就问：张四维那肯让你带枪回来呢？兵士们个个气昂昂地说：他不肯我们就开枪打回来。

总之，吴坤、李琦、彭一飞能够毅然决然地把武装完整的队伍带回县城，不仅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而且为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带来了新生，得到了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的光荣称号。

张四维得知吴、李等率部回县城后，气急败坏地在枫寮宣布：吴坤、李琦等部都是叛军，马上报请省保安司令部进

剿。并对那些在枫港的官兵宣布：如有不愿走的，仍可允许缴枪回去，这不背违反军令。因此，张学年中队的官兵大部份都缴械立即离开张四维，其余一小部分也在撤走的途中，开了小差各自回家。结果，张四维只带着剩下的一部份（即张罗所部）残余官兵到达南昌，而这时他的老上司胡素早与省主席方天逃之夭夭了。张四维走头无路，只好回窜到瑞洪，重新招兵买马，网罗一批流氓、铲钢、鄱湖散匪，组织了一个大杂烩队伍。为了解恨，他准备带队进县城来一个大抢劫、大屠杀。事情很凑巧，张四维一进城，就得到密探孙香敦的报告，说共军的兵船今晚停泊在马背咀北岸的消息。张四维认为突然夜袭共军，准能讨到便宜。故此，他立刻下令迅速向马背咀戒备前进，张罗的尖兵很快越过了耿耿桥，但还没有到达有效射程的时候，张罗的轻机枪走了火。解放军闻警，很快冲上马背咀的圩堤上，用轻、重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掩护部队从两侧包抄张四维的进攻部队。这群匪徒见势不妙，纷纷向后乱窜，有几个士兵当即在耿耿桥向解放军举手投降。张四维、张罗等只好带领一部分人绕道神仙港，向瑞洪方向逃跑。次日，在途中被汤家村的老百姓全都缴了械。赫赫一时的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付总队长张四维，其美梦从此也就彻底破灭了。

当张四维等作最后挣扎时，吴坤的一营和李琦的二营已改编为四个中队，仍称自卫总队。李琦率原部驻在古埠乡的蔡坊村，吴坤率原部驻在华林岗乡小溪坂村，他们隔河呼应，一方面戒备张四维的袭击，另方面相机待命，随时准备向解放军投诚。

5月7日上午，人民解放军二野第五十二师师长吴道敏和李参谋带领一个主力团解放余干县城，进驻县政府。前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兼军事科长胡先当即向李参谋接洽，汇报自卫总队的情况。下午，副总队长张秋林中校和李琦、吴坤少校身穿国民党军服（已摘掉帽徽）走进县政府大礼堂，向李参谋投递名片，联系投诚手续。不久，中共县委书记杨村夫和县长阴明村等走了进来，李参谋把胡先和张秋林等四人向他们互相作了介绍。杨书记听说胡先是军事科长，是来联系地方部队投诚的，非常高兴，就把他单独叫去小房间内汇报部队情况。胡先当时把带在身边的自卫总队编制名册和武器装备清单交出，杨看后甚是赞扬，并叫胡先通知部队在原地待命，听候接收整编。

5月9日是余干自卫总队获得新生的日子。上午11时左右，张秋林带领吴坤、李琦等共367名官兵集结于考棚小学（现县委党校院内），列队站好。他们把11挺轻机枪和300多支步枪分别架好，队列后退三步，欢迎杨村夫书记和解放军一位军官讲话。最后杨书记号召大家，愿留下参加革命的可到徐家祠（县委党校对门）报名登记，不愿留下的可以遣送回家，自谋职业。

从此，余干县民众自卫总队的367名官兵就走上了新生的道路，成为建设家乡的劳动者。

参加成都起义的一些回忆

张鸿图供稿 黄文政整理

1926年以一个爱国青年的热情，为了国民革命，

毅然参加了国民党北伐部队。三十余年随军转战南北，历尽艰辛，取得了北伐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我身不由己陷落在泥坑里。随着形势的变化，我越来越认识到反动派必败，人民必胜，思想上逐渐由怨（内）战发展到决心弃暗投明，参加起义。

1949年9、10月间，西北的西宁、银川和南方的广州相继解放，战争的重心已转到西南。蒋介石的最后王牌——胡宗南（川陕甘边区绥署主任）部败退到川西北，宋希濂（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罗广文（十五兵团司令）、郭汝瑰（七十二军军长）等部集结于川东，企图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保住川、康。其军事指挥机关——西南长官公署就设在重庆，长官为张群。我当时在西南补给区任重庆汽车运输办公处上校主任，隶属于联勤西南补给区司令部（又称第四补给区，司令为邱渊，邱逃台后，由原副司令曾庆集继任，负责西南地区部队的给养），我的任务是负责重庆的军用汽车的调度、派遣和装卸、行驶等业务，归运输处少将处长陈大业指挥。重庆解放前几天，我奉邱渊司令之命撤到成都，改归第七补给区（该补给区是随胡宗南败来川西北的，司令程开椿，专管胡部的补给），由运输副司令熊志少将指挥。担任新津汽车运输办公处副主任，因主任车家勤未到职，就委我代行主任职务。

1949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杨勇（第五）兵团在解放贵阳后，以主力西出毕节，进入川南，相继解放

泸州、宜宾、乐山、自贡等地，进出于成都以西的邛崃、大邑一带，截断了蒋军往西康的逃路；同时陈赓的第四兵团自广西沿桂越、滇越边境进军，直抵滇越边境的芒市、龙陵、腾冲等地，形成更大的包围圈；贺龙、李井泉指挥的周士第十八兵团和二野的陈锡联兵团及四野一部，分别在陕南、川东击破胡宗南、宋希濂、孙震（十六兵团）等部，分东北两路浩浩荡荡向四川长驱直入。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督胡宗南率部固守。12月7日，胡宗南任其第五兵团第三军军长盛文为成都卫戍总司令，并调其精锐第三十六军担任城防（当时胡部李文五兵团、李振十八兵团都部署在成都及其附近外围地区，并以其精锐的第一军即陈鞠放军，守备新津机场）。由于蒋介石集团内部一贯是四分五裂，勾心斗角，就是在其嫡系之间，也是尔诈我虞，明争暗斗，常闹磨擦。在解放大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形势下，对地方派系更加视为异己，极不信任，想方设法分化、削弱以至排斥，并吞。经解放军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于是12月9日卢汉（云南绥署主任兼云南省主席）在云南通电起义；同日国民党元老熊克武、高级将领潘文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甩脱蒋、胡的控制，在彭县联名通电起义。刘部二十四军军长刘元暄和邓、潘两部将领黄隐（九十五军军长）、潘清洲等率部通电拥护起义。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把部队扔给胡宗南，只身逃台。接着胡宗南也于23日飞逃西昌。这时国民党军政人员乱成一团，成了群龙无首，各自打算，彼此隐讳，互不相告的局面。除少数顽固分子企图率领残部突围由西昌、滇西等地，

相机逃越国境梦想东山再起以外，~~绝大多数的官兵~~却是抛去幻想，积极准备，待机向人民解放军奔袭要隘。我们西南联勤在成都共有大小80多个单位联名起义，特别是在凶狠残暴而又狡诈多疑的胡宗南率重兵镇守的成都举行起义，确实是很不容易，决不是在旦夕之间就贸然作出决定能够成功的。

早在1948年，曾庆集任联勤总部副参谋长，在上海主持美援物资督导团兼任上海港口司令时，地下党员曾学圃（后化名幼农，在成都打入联勤总部西南区第四十四补给分区任秘书兼西南第一路第五军政训处处长，专搞成都联勤部队的策反工作），就对他进行过争取工作。1949年4月曾庆集调四川任第四补给区副司令兼驻成都的四十四补给分区司令后，就和副司令陈德林、杨良勋，参谋长王杰，（字樵生）等人积极准备，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调整了四十四补给分区司令部及其所属单位的人事，组织“杰生”部队（“杰生”系取王杰的名、字各一字，印制官兵臂章），这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成都的具体情况，接受二野裴治容同志2月间在上海搞兵运时对王杰的指示进行的。后王杰在成都，裴又函示要密切与邓锡侯部九十五军副军长杨晒轩紧密合作，互相支持，共策进行。10月初，他们在原国防部部员兼西南区反情报队队长徐震球（徐早年是朱德的部下，深受进步民主人士的思想影响）家里秘密策划，由王、徐二人利用国防部新军训练处直属纵队第七总队少将正、副总队长名义，以联勤部队为基干，加上策反过来的部队编组成四个支队。为了使“杰生”部队取得合法地位，地下党（中共驻蓉支部）决定由徐震球通过关系与四川治总王缙绪联系，编

入“治总”改名为西南第一路第六纵队第一总队；不久，又改为西南第一路第五军。军长由曾庆集兼，副军长王杰，参谋长刘鹤年，下设政训处（处长为地下党员曾学圃）、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经理处、警卫营、修械所、军乐队；下属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师计八个团的兵力。“杰生”部队组成后，在地下党领导下，曾掩护川康人民游击纵队的首长和干部在成都活动，并支援游击队的枪支、弹药。在相机策反组建起义部队的同时，曾学圃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及刘伯承司令员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五条广播等宣传文件交王杰给有关人员秘密传阅。我当时在成都市西关居住，经常与王杰、徐震球、熊志等人会面，在言谈中使我在思想认识上受到很大的启示；但那时和同事、朋友谈及当时的去向时，只能以隐讳、暗示和试探方式说“走不走？”

“不走！”或以点头摇头表示逃不逃去台湾。通过这种方式接触，我和西南补给区独立司令朱和生、参谋处副处长陈拔优、辎校教育处长许权、八十七兵站支部长陆宝俊及七十六军（属裴昌会七兵团）副军长汤燕生等人相互暗通了参加起义的信息，当时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我们为了妥善保护军用物资，给养困难就想方设法维持官兵们的生活。对于起义和解放军及地下党的关系，我们一致同意由王杰、徐震球、曾庆集等人负责。这时，胡宗南在成都拥有重兵，我们在执行他的命令时，总是大打折扣，采取软拖的办法应付。如10月下旬胡调其第一军增援重庆，命令四十四补给分区司令部军车八百辆日夜运送，当时补给分区藉口征车困难，只提供了二百辆，半个多月还只运了一个师，严重的影响了胡的作战